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上的学理和哲理

· 顾海良

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这六个“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理论特质,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学理和哲理上的运用和创新。

一是在世界观上,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立足中国国情、拓展世界眼光、把握时代变迁的理念;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系统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式现代化从世界文明进步和发展的高度,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解决中国的、也为探索世界的现代化问题作出贡献。

二是在价值观上,深刻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让人民获得解放是根本价值追求的信念。“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中国式现代化要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三是在历史观上,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从国情出发发现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坚持历史主体、把握历史主题、坚守历史自信、保持历史耐心,永远把住历史进步的立场,不断推进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进展。

四是在文明观上,坚持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式现代化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融入中华文明观的精髓和精华,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以中国新文明观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五是在民主观上,中国式现代化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人民民主,重在“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民主是民生的政治保证,民生是民主的重要体现。要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层次上,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六是在生态观上,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这六个“观”,深刻地落实于中国式现代化主要内涵和本质特征之中,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内在的学理和哲理规定。其中,世界观落实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特征”的理论和实践之中;价值观彰显于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目标之中;历史观呈现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的探索之中;文明观体现于“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中;民主观凸显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提升美好生活的质量和水平;生态观体现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之中,“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这六个“观”,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六个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有着深刻的联系。要在六个“观”和“六个坚持”的结合上,深刻感悟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和哲理,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体系”上呈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谛。

(作者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加强学科本土化建设 推进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

· 阎凤桥



为建设教育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是北京大学的使命与担当

价值不可小觑,中国的学术也要从边缘走向中心,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

学术的本土化

社会学界多认可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在20世纪前半叶针对中国现实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为创立中国社会学奠定了基础。针对时弊,王铭铭指出“我们今天社会科学范畴内更愿意懒惰地借用现成的西方概念来认识自我,以此方便地展开我们的研究。”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一谈对于学术本土化的看法。

第一,静态意义上学术本土化的必要性。对于历史事实进行缜密的甄别,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世界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持世界同质观点的学者容易忽视本土化的价值,反之,持世界异质观点的学者会关注并发现本土化的独特价值。在像梁漱溟等许多学术前辈眼中,文明的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没有优劣之别。作为反映客观事实规律的学科,就应当关注到这种差别,在差别上找到学科发展的突破口。

第二,动态意义上学术本土化的必要性。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起源于西方国家,是在西方民族国家及其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一个现代化过程。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伴随

着“殊相”与“共相”之争。现代化肇始于英国和法国,在传播到其他国家过程中,都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其他非西方国家中的去殖民化运动,以及在英法两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内部出现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和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西方现代化模式提出了挑战。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一些问题,诸如资源枯竭、环境破坏、道德沦丧等,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对于西方式现代化的质疑和学术界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声音。既然西方现代化是存在着偏误的,建立在对其研究基础上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反映西方社会实情,这些学说是否可以拿来指导其他国家的实践呢?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目标都无法虚地凭借外来模式而不发本土资源得以实现。

“本土”与“国际”关系

如果我们把清末废止科举和兴办学堂视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起点,那么一百多年来,包括学术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的“殊相”与“共相”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没有消失过,只是紧张程度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别而已。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中国高等教育在提高普及化程度的同时,也把提高质量和追求卓越作为一个重要目标。这就是从211工程、985工程到双一流工程的接续,它们都是要把中国高等教育带到世界水平的举措。但是,对于学术卓越却因学科差异而难以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标准。早期的提法侧重于世界一流,而2015年之后的提法则由两个部分组成:“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这种转变意味着“殊相”与“共相”关系在高等教育建设中有调整,也可以说是“本土”与“国际”关系的调整。强调本土化的当代价值,不是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放弃国际化的目标。而是说,对于从别国借鉴来的东西,需要经过一个本土创造性转化。

学科本土化的举措包括:增强本土意识、主体意识和学术自信,发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开展问题导向的学术工作,注重理论与经验的对话,建立自主知识体系,为文明的和谐与人类的共同进步贡献中华文明的智慧。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理论解读

党的自我革命及其制度规范体系建设

· 王久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性提出党的自我革命重大命题,精辟阐述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意义、基本内涵、实践要求等一系列根本性长远性问题,极大深化了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从党的自我革命重大命题的提出,再到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强调,这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自我革命上升到战略性的高度和制度化建设新阶段。

党的自我革命丰富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内涵,强化了党的建设主体的自律自严自戒自励。

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注重自身建设,形成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完整、丰富的思想体系,并先后将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

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毫不动摇全面从严治党,全力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按照这一目标要求,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重大课题,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尤其提出了自我革命的概念,并多次论述自我革命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性、自我革命的内涵和实践要求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要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党的自我革命,突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和革命性;强化了党的建设的主体性的自我警醒、自律、自严、自戒、自励的决

心、勇气和意志,增强了主体的内在自我约束、自我革新;考验了主体能否真正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敢于浴火重生,彰显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崇高的革命品格。这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规律和长期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大丰富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内涵。

加强和完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是党坚持依规治党和制度治党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逐渐积累了管党治党制度建设的经验,形成以党章为最根本的遵循,以其它党内法规和制度为支撑的制度规范。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同向同行,不断制定、修订和完善各类党内法规,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法治化。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形成了“1+4”为基本框架,即在党章之下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四大板块。截至2021年7月1日,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615部,主要有党章、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7类名称。中国共产

党在其百年自我革命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依规治党、制度治党具有长期性、根本性、稳定性,同时必须建立制度规范体系。这是由党的自我革命内容的系统性和制度本身的系统性决定的。党的自我革命是一场包含思想革命、组织革命、作风革命、纪律革命、反腐败斗争等全方位的革命,本质上涉及科学价值观的塑造、权力的行使与监督、组织体系的健全与优化、党内民主与监督等诸多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的工程。因此,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也必然是一个系统工程。同时,中国共产党百年制度治党的实践也证明,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和优化的系统工程。随着党的自我革命内容和方式的创新,建立新的制度或者完善既有制度成为必然的选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在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遭遇的困难和挑战必将无比艰巨。因此,党的自我革命的内涵更为丰富,党的自我革命的深度更为宽广,自我革命的要求更为严格,自我革命的方式更为多元,这一切也都必然要求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更为科学化、体系化、具体化。

(下转第6版)

北京大學 校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专刊